

〔以色列〕 S.N. 艾森斯塔特 著

日本文明

一个比较的视角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日 本 文 明

——一个比较的视角

〔以〕 S. N. 艾森斯塔特 著

王晓山 戴 茸 译

商 務 中 書 館

2008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明:一个比较的视角/[以]艾森斯塔特著;
王晓山,戴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978-7-100-05561-1

I. 日… II. ①艾…②王…③戴… III. 日本—历史—研究 IV. 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99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日 本 文 明

——一个比较的视角

[以] S. N. 艾森斯塔特 著

王晓山 戴 茸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5561 - 1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7/8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序言：日本之谜	7

第一部分 现当代日本

第二章 明治国家与现代日本社会	31
第三章 现当代日本——制度的形成	64
第四章 现代日本社会的困惑	104
第五章 “不和谐”、冲突、抗议及其影响 ——管理、控制与回应	130
第六章 现当代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一个充满活力的、受控制但非极权主义的社会	172

第二部分 日本历史发展的侧面

第七章 日本的封建主义	197
第八章 中世纪与现代初期日本的城市发展和自治	211
第九章 德川国家与社会	221
第十章 日本的儒教与佛教转变的几个侧面	263

第十一章	明治维新——革命的复兴	315
------	-------------------	-----

第三部分 日本历史发展的框架

第十二章	日本的历史发展——日本社会形成的 独特性	331
第十三章	日本文化或文化传统——基本的本体论观念及其 影响	374
第十四章	文化、社会结构及日本制度发展变化的形成与再 生中的过程	410
第十五章	简论日本文化的创新模式	456
第十六章	比较框架中的日本历史发展	471
第十七章	日本的现代性——当代世界中的日本	507
注 释		529
索 引		689

前言

ix

本书是我对日本、日本社会及其文明长时间关注研究的成果。我曾阅读摘录过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诺曼著的《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迄今仍积累了相当详细的笔记。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不断地、系统地依据用西方语言撰写的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以及从日文译为西方语言的译著等进行研究。不过，仅仅在七八年前，用文明比较分析的框架来剖析日本才成为我研究的中心——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已陈述了这些因由。

在 1978 年至 1990 年的夏季期间，我曾在胡佛研究所当客座研究员，在斯坦福大学做客座教授。在那时即从事这项研究，本书正是基于此。1988 年秋，我在纽约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做客座研究员时继续从事这项研究。1989 年至 1993 年的春季，我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客座教授。1992 年秋季和 1994 年春天，在乌普萨拉的瑞典高级社会研究学院做研究员期间，我依然不辍地开展研究工作。

无论是研究工作还是写作，首先都是在我的耶路撒冷的大本营中——希伯伦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和杜鲁门研究所以及范里尔耶路撒冷研究所进行的。在所有的这些研究所里，我都获得了多种类型的资助——图书馆设施、研究资助、秘书服务等等。在各个大学里，我非常喜欢跟那些参加我主讲的有关日本社会与文明研究课题的研究班的学生们进行讨论。不论在大学或是研究所，我从与同事们的讨论中受益匪浅。这项研究在各个阶段还得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文科学院、以色列基金董事会、中国台湾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以及苏黎世社

会世界基金等的资助。

本书也从我在各研究所及学术聚会中就相关课题所做的讲座和研讨会的探讨中受益良多——这之中包括斯德哥尔摩大学、香港大学、J. 尼赫鲁大学和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基金会、台北大学和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类文化化学研究所、俄亥俄州立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 T. W. 德巴里研讨班上)、乔治·梅森大学、东京德国日本研究所、神户大学、关于日本社会比较文明 1998 年研讨会、1994 年秋在京都召开的日本研究会议、1992 年 3 月在慕尼黑由莫姆森召集的关于马克斯·韦伯与日本研讨会以及 1994 年 6 月布鲁宁根学院等。1989 年,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我举办了泰纳讲座,特别是在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主席的主持下举办的与这些讲座相关的研讨会上,我讨论了在此所分析的一些题目。

1987 年,我与本阿里·希洛尼、艾尔·本阿里在希伯伦大学的一个小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从而臻至此项研究的高峰。这一共同研究的结果是撰写了一部关于日本冲突革命模式的书。

在准备撰写本书期间及之前,在我对日本产生的更广泛的兴趣方面,一直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朋友和同事们,我与他们就日本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过讨论,特别是那些颇费工夫阅读本书部分书稿的朋友和同事们。在美国我与亨利·罗索夫斯基和罗伯特·贝拉、在日本与石田雄、在耶路撒冷与 R. J. Z. 威布洛斯基、在英国与 R. P. 多尔就日本问题进行的讨论时间最久,持续时间最长。在最近的 10 年左右,则是与在耶路撒冷的本阿里·希洛尼、R. J. Z. 威布洛斯基和本阿里也一直是本书几部分手稿的最忠实的读者和批评家。这些年来,我更是断断续续地与阿克雷格、赫尔伯特·帕辛和埃尔文·塞内进行过探讨,他们也对较早时的书稿的一些章节提出了意见。

在本书撰写的准备期间,我还与 J. C. 亚历山大、青木昌彦、珍·巴

哈尼克、安德鲁·巴谢、布鲁斯·布埃诺·德摩斯奎塔、常浩、T. W. 德巴里、吉安尼·福德拉、卡洛尔·格拉克、约翰·赫莱、滨口江干、苏珊·汉莱、苏仇言、阿里克斯·英克勒斯、石久彦、M. B. 詹森、隆·杰佩森、富樫冈、约翰·凯莱、塔克·黎布拉、S. M. 利浦塞特、汤姆·梅兹格、约翰·梅耶、杜维明讨论了本书的不同方面；之后又与村上泰亮、永井道雄、中根千枝、皮特·诺斯科、肯尼斯·皮勒、艾拉纳·F. 西伯、E. 狄雅基安、弗雷德·维克曼、绵贯让治、比琼·维特洛克、山村耕造等进行过讨论，以及同前述提到的有关日本的讨论会与研讨会的参与者们进行过探讨。我还与团冲本、詹姆斯·拉斐尔、汤姆·罗伦以及他们在斯坦福举办的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研讨会的参与者们进行过讨论，并同纳迪雅·斯庞交换过意见，他就我对明治维新的分析进行了批评性的论说。

所有这些讨论，在我对日本文明研究及对本书不断修正的研究方法上的具体化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最为感激的，当然莫过于对那些同事们和朋友们，他们贡献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来阅读本书的部分原稿，甚至整个手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人之外，我还想要感谢约翰·P. 阿纳生、春实部夫、艾尔·本阿里、卡尔·比利费尔德、玛利·布林顿、皮特·杜斯、雷蒙德·格鲁、H. 哈鲁突尼安、唐·利文、罗伯特·C. 麦克亚当斯、伊丽莎白·麦克斯维尼、名持田哲男、大贯惠美子-蒂内尼、弗兰克·雷诺兹、B. 西伯曼、罗伯特·史密斯、埃兹拉·沃格尔和凯惕·维尔德曼-纳凯，他们都给予了我十分宝贵的建议、帮助，并对手稿的大部分提出过批评，有时还不只一次。由井久美藏在1994年春夏待在耶路撒冷期间，通读了全稿，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并且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给予了许多帮助。埃里克·科恩和雅尔·本·托尔就有关日本儒教和佛

教转变的章节提出了详细意见。

所有这些朋友的评价和意见以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两位不知名的读者提出的意见,对我均是无比重要的,他们都指出了我在分析论述方面的问题,并帮助我克服了至少一些——当然不是全部——落入由某人撰写的日本研究的窠臼,这种人没有阅读过日文并且没有直接接触过日文资料和学术著作。本书无论有多么成功,大多都应归功于他们——我希望能够遵循他们的全部意见或建议;毋庸赘言,我要对许多余下的谬误负全责。

不少人作为研究助手帮助过我,并提供了秘书与研究上的支持。我的秘书贝惕雅·丝洛尼姆在范里尔耶路撒冷研究所的岗位上在书稿准备的各个阶段中充当了忠实的协调人的角色。德比·梅左、戴维·科翰、辛济亚和艾尔伯托·格鲁兹曼,首先是玛利奥·施杰特曼和诺尔米·雷纳作为研究助手在寻找收集无数的参考资料及准备附注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多隆·科恩在审阅手稿方面给予了有益的帮助,其中尤其注重日文的拼法,并检查了附注。我还得到了上述研究所的图书馆以及东京的日本国际会馆的图书馆和会馆经理 M. 加藤先生的鼎力帮助。

摩里斯·利维,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艾塞尔·罗森费尔德帮助打印和重打了本书手稿的大量原稿,斯坦福的巴芭拉·坎农、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卡米勒·耶兹、乌普萨拉的 SCASS 的理查德·凯尔索、阿索·林伯格和雷纳·弗思特以及芝加哥的克劳德·格雷格尼尔也都帮助打印了原稿。克劳德·格雷格尼尔还协助编辑了不少原稿,而且重要的是,在最后编辑和删减手稿的关键阶段他所提供的帮助。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道格·米契尔一直是位乐于助人和值得信赖的编辑与朋友,他的支持使整个编辑过程乐趣无穷,马特·霍尔德也是如此。约尔·司科尔在编辑手稿方面堪称奇迹,他帮助我避免了许多

谬误；桑德拉·瓦尔德也复如是，他是芝加哥大学专攻日本历史的研究生，协助校对了文稿；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玛格丽特·马翰指导了编辑和校对。

所有这些努力与我对这些朋友所抱有的感激之情，是否值得，都不是由我来断定的，而是留待本书的读者去判断。

S. N. 艾森斯塔特

耶路撒冷、希伯伦大学暨范里尔耶路撒冷研究所

日本人名按日语顺序(首先是姓)出现,除习惯上用英语发表作品的那些作者。日文词按照研究社辞典体系直译出来。

第一章 序言

1

日本之谜

《日本强国之谜》是最近颇有影响和引起争议的一部书，该书由荷兰新闻记者卡雷尔·范·沃尔费伦撰写。¹ 日本对于西方一直是一个谜。几乎从 16 世纪日本与西方相互接触以来，尤其从 19 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引起西方学者和博学多闻者的兴趣。日本一直是一块充满魅力、引发赞叹、诱导嫌恶的磁石，或者说是由此产生某种混合情感的磁石，那么探求解明这个独特社会和文化便构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挑战。

在欧洲和美国，对日本的兴趣乃作为探索异邦的重要部分而产生的，“异国的”文化探索随着许多伟大的发现和欧洲的扩张其势头日趋增长，这些后来在人类文化学和人类社会学著作中达到高潮，并且是用艺术风格的笔触描绘的。可以肯定是从 19 世纪以后，几乎从这种探索一开始，对日本魅力的迷恋在两个决定性的方面不同于其他异国的或异邦的社会。不久之后，人们很快就洞见到日本所具有的独特性和特异性，并非在于它与欧洲或美国的全然不同，而在于它将这种巨大的差异性与跟西方广泛的相似性结合在一起。由于西方和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接触，日本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首先是军事力量，其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为一个工业大国，这在西方，不断地激发起人们对日本独特性之关心。日本取得的这些成就唤起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某些最基本假设的重新审视。²

19 世纪，日本对西方人的探索敞开大门后不久，西方的人类社会

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以及更广范围的公众发现，日本不仅是另一个遥远的、“原始的”抑或“深奥难解的”社会，这一社会可以被视为适宜于某种乌托邦似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在这一社会中能找到人类生活的初级形式。当然，西方的旅行家和观察家们对日本社会的各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方方面面一直抱着津津兴味进行记录和报道，至少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³

但是很快，这些观察家们以及更富学术价值的著作却强调日本现实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论述亚洲国家的著作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即日本在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某些十分重要的方面非常类似于西方。甚至在明治时代大力推动现代化之前，曾访问或滞留过日本的许多西方传教士都观察到，日本在诸多方面是一个组织良好的文明化的国家。⁴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依据“现代化”、城市化、教育水平、通讯等等的标准，日本可以与任何西方国家相媲美。将日本与西方进行比较，既强调其差异性又强调其相似性，业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公开论说方面司空见惯之事。

E. H. 诺曼的经典著作《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出现》⁵ 集中分析了作为封建制度的德川统治时期，它可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匹敌，即使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欧洲。人们常常把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尤其与德国，它具有快速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与一个现代的、专制的、半立宪统治相结合的特点。

尽管日本也遭遇过失败与危机，例如大正时期所谓民主潮流的失败和20世纪30年代军事统治的发展，常常被视作同一时期法西斯运动方面的变种。它的军事扩张可以与纳粹德国的军事扩张相比较，正如塔尔考特·帕森斯所论述的那样。⁶ 明治维新又常常跟伟大的欧洲革命进行比较。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小马里恩·J. 利维⁷ 及稍后的约翰·佩尔泽尔⁸ 都确认了日本与工业化更为成功的

欧洲国家尤其英国之间在制度模式上的相似性。关于家族和亲属组织，人们又常把现代日本的政治模式与德国的政治模式进行比较，如莱因哈德·本迪克斯。他们均强调在日本跟在英国一样，核家族、长子继承权的重要性，或者像继嗣的某些功能替代人以及更广的松散亲族关系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用这些方法他们可以³动用和引导家族资源于工业化上。50年代中期，R. N. 贝拉出版了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德川宗教》，在书中他试图寻找新教伦理在日本可能存在的对等物。⁹

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人们将日本作为一个自上而下推进民主化的可行案例进行考察。从50年代以后，在急速开展起来的对现代化的研究方面，日本构成了一个主要的焦点。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学术研讨会既讨论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特点，也研究现代化独特模式的表现。

这不仅仅涉及现代，我们业已指出的日本与欧洲社会之间存在的制度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早在本世纪初始，杜克海姆就指明日本的制度史对于欧洲的制度史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在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从旨在建立帝国的家族君主制到专制主义的君主制。¹⁰ 马克·布洛克在其有关封建主义的经典研究中遴选出日本作为与欧洲最接近的实际例子。¹¹ 甚至更早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浅川加日即对日本和欧洲的封建主义进行过深入的比较。较近时则有琼·巴切勒从事这一主题的研究，他把资本主义在日本的成功发展归功于一个强有力的封建体制的存在，就像在欧洲那样。¹² 正如往后将会证明到的，有关日本历史的不同方面和时期，近来这种比较已经做了不少，譬如德川统治时代与欧洲17世纪专制主义国家的比较。¹³ 正如上述，明治维新常常与伟大的欧洲革命相比较。¹⁴

不过，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讲，日本不仅是完全且比较成功地实现

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而且似乎是以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其生活的。因此,日本的独特性越来越被认为是在于它结合了与西方许多制度上的相似性,尤其与欧洲,由于这种特殊的方式,它似乎不仅保持了近乎神秘的文化模式,而且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本身模式。承认这种结合——与西方的相似性同时伴有广泛的差异性仿佛影响了日本人的行为和制度框架的诸多方面——30年代和40年代撰写和出版了涉及这方面的许多有见地的书,如E. 莱德尔和E. 莱德尔-塞德勒著的《转变中的日本》;¹⁵库尔特·辛格的《镜子、刀与宝石》¹⁶(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版);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力作《菊与刀》,¹⁷写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后很快出版,该书统治了有关日本研究的论述多年;乔治·桑塞姆有关西方与日本的讲义等。¹⁸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一基本的研究方法迅速地不断发展,如战后琼·斯托泽尔的《菊与刀之外》。¹⁹

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经济上开始显示出的巨大成功,人们从学术上来解释日本的努力应该说开始有增无减,这是很自然的。在此所进行的比较,特别是从70年代以后,更频繁的是与美国的比较而不是欧洲。²⁰或许对日本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独特方式最为重要的描述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产业关系的模式,它既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少最初这种模式表现为某种鲜明的和谐式的家族关系。²¹这种模式的重点在于较少出现罢工;公司拥有工会是很普遍的,至少在私人企业中;论资排辈和终生雇佣的体制;以及一般员工对所在公司所具有的高度认同感。

五六十年代随着日本成功的经济发展,系统的研究开始繁荣起来,在那些研究领域,人们认为日本似乎最接近西方,如在它的政治制度结构方面,法律和立法行为方面,以及警察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些

研究始终强调的不仅是日本与西方的相似性，而且是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性。²²然而，随着日本不断成功，这种差异性的本质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在 70 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将日本工业化的巨大成功与西方工业化的发展相对比的时候。因此，对日本与西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强烈关注就更与日本同西方在国际舞台上的交往接触息息相关。

日本的成功触及西方人自我认同感的某些中枢神经，它在西方的不少人中间引发了广泛的内省。在 19 世纪后半叶即已出现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回头意识到，日本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国家——一个充分文明化的国家，即使它所采用的方式不同于西方，但它几乎是中国的现代工业化的翻版，如莱布尼茨所认识的那样。²³谈起对日本早年进行的一些研究探索的课题内容，那就是能否在一个具有等级制度、表面上受约束的，而且注重美学和个人修养的高度民主文明化的社会中找到幸福和达到人的价值完善，而这又被转变为另一个问题，即有无可能将这些特质和经济的成功结合起来考虑。在所有的这些讨论中，涉及较早时所指的日本人的强烈的集团承诺意识、忠诚、和谐、一致，²⁴这些论题无论在西方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的讨论中都得到着重强调，并被视为理解日本社会独特性和其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所在。这些论题与西方主张的高度原则性、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态度及意识形态的对峙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福斯科·马雷尼——一位敏锐的意大利日本问题观察家、学者和分析家非常简洁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日本是一个冲击。它使我惊醒。在这里，一个高度文明发展的国家沿着另一条道路臻至成熟、达到辉煌，实际上它的成功与西方所崇拜的那种精神力量没有丝毫关系，即经典教义、基督教精

神、宗教改革(或者说实际是反宗教改革的)。而且在这里道德凝聚力或称正直的例子以及精神上成熟的例子比比皆是,较之我以前所见的一切要多得多,鲜明得多。我无法事无巨细地来讨论一个漫长的精神发展过程,但最终问题会显得简单明了,即基督教精神包含了历史或者说历史包含了基督教精神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基督教精神、西方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它们是相对的,是人类发展中的历史阶段。文明也许会在众多种族中繁荣昌盛。上帝也许可以用许多名字称呼。唯有人和围绕人的神话才是最终的。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都试图在意识世界与存在、时间、死亡、邪恶的挑战之间的断层上架起一座桥梁。没有人握有开启的钥匙。不存在上帝的选民。一切人类——从凿石的尼安得特人到发现关于宇宙精髓理论的爱因斯坦——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是经过同样的历史范畴而生活的。

也许通过其他的交往接触和经历我已获得了相似的观点,但我不知道,是否没有日本的冲击,那一研究的发展线索本来即会如此清楚和直接。日本实实在在的存在对我们曾经所抱有的最熟悉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挑战。它的象征性的重要意义远比其在世界历史上的不足为道的地位要大得多。如果没有日本,或许会权且发明一个。²⁵

英国小说家安吉拉·卡特以多少更具体的方式描述了一幅相类似的画面:

一位跟我年纪相同的日本青年的经历非常像我。我不会去谈论那一事实:他或许能够建立我所具有的同样的均衡,这均衡是出于精明的犬儒哲学侥幸的衰颓之命运,那是我的国家给我的。但